

第 17 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十七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丁如筠
责任校对：丁如筠
封面设计：鹿耀世
版式设计：王丹丹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Guowai Zhongguo Jindaishi Yanjiu
第十七辑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260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500册
ISBN 7·5004·0730·0/K·88 定价：5.05元

目 录

- 1 郭松龄事件与日本帝国主义.....江口圭一
曲建文译
- 25 围绕马嘉里事件进行的英中交涉
——至威妥玛第一次离京.....神户辉夫
周泮池 邢友德 白子明译
- 47 同治末年清朝洋务派的日本论
——以李鸿章为中心.....佐佐木扬
周泮池译 白子明校
- 74 1905—1906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的再考察
——美国华人的作用.....德尔伯·L·麦基
刘岳斌译 梁茂信校
- 96 美国老中国通的遭遇卡恩 林海译
- 132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L·J·洪
蒋光明 冯治 张士义译
- 147 中国革命：共产国际的讨论.....A·H·卡尔图诺娃
李金秋译
- 166 当代外国史学著作对孙中山的评介...C·Л·齐赫文斯基
杜华译 李玉贞校
- 182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4)的捷中关系
伊凡娜·巴凯绍娃
陈广嗣译

资料

- 208 民元北京兵变记 葛兰言
黄庆华译
- 227 华北自治运动的演变 王美秀译 马斌校

书评

- 242 评保罗·A·科恩的《探索中国的历史：美国论述中国
近代的历史著作》 哈里特·泽恩多弗
曾学白译
- 248 评《南京事件的反省》 冈部牧夫
于奇译

动态

- 253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在日本 后藤延子
韩一德译
- 271 外国在华机关公团名汇（三） 黄光域辑

郭松龄事件与日本帝国主义

江口圭一

一、序

1925年11月22日，奉军将领郭松龄在滦州举兵倒张作霖，率大军向张的大本营奉天进击。当时，为攫取北京中央政权，中国军阀之间纷纭复杂的争斗仍在继续着，郭松龄的起兵，意味着这场争斗的新发展。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依附英、美帝国主义的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依附日本帝国主义的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北京中央政权由段祺瑞把持。以奉天为大本营的张作霖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成为中国东北最强大的势力。1920年，追随冯国璋的直系军阀曹錕、吴佩孚等联合奉系打败了皖系，夺取了北京中央政权。这种局面进而加剧了一心想往关内扩充势力的奉系与直系的矛盾，并最终导致了1922年4、5月间第一次直奉大战。结果，奉系战败，被逐出关外。翌年6月，曹錕就任大总统。1924年4月，隶属直系的江苏省督军齐燮元与隶属奉系的浙江省督军卢永祥开战。奉系与皖系缔结了反直联盟，以这场江浙战争为序曲，于9月18日拉开了第二次直奉大战的帷幕。直奉两军在山海关附近激战。正当战局的进展有利于直军之际，隶属直系的冯玉祥于10月23日倒戈，发布国民革命宣言，在直军的身后径入北京城。于是直军全线崩溃，曹錕被囚禁，吴佩孚败走武汉。反直联盟的胜利，使皖系的段祺瑞得以卷土重来，组成了临时政府。此时，张作霖不仅巩固了他在满洲的地位，而且还控制

了直隶（天津）、山东、安徽、江苏等省，将其势力探伸至上海一带，并给他的僚属分封了地盘：张宗昌——山东、杨宇霆——江苏，天津先后被封给了卢永祥和李景林。与此相应，冯玉祥的国民军占据了直隶省的一部分（北京）以及河南、察哈尔、热河等中国的西北地区。

然而就在北方军阀如此无休止地争夺北京中央政权之际，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也有了急剧的发展。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4年1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结成了革命统一战线。国民党政府以广东为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冯玉祥的倒戈，肯定也是受到了这个发展着的革命运动的影响。1925年的五卅运动以及此后发生的激烈的反帝斗争，把中国革命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反帝的民族主义汹涌浪潮吸引着中国人民，使他们投身到斗争中来，这就进一步壮大了反对张作霖的潮流。此外，根据华盛顿会议协议，中国关税会议定于1925年秋季在北京召开，这件事促使各派军阀之间展开更加激烈的争斗。会议的结果，可以料到，增收关税将成为争斗的目标。因此，各派系加紧了攫取北京中央政权的活动。10月16日，浙江省督军孙传芳组织联军，点起了反奉战争之火。尔后，吴佩孚看到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便就任“讨逆联军总司令”，开始向奉军发起进攻。奉军节节败退。这期间，在西北地区，自五卅事件以后革命色彩越来越浓的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与奉军的矛盾加深了。冯的国民军从侧面威迫奉军，作出呼应反奉的架式。两军在加紧备战。段祺瑞政府对即将举行关税会议之际日益陷入大动乱之中的政局感到惶恐不安，因而谋求冯、张之间的妥协。双方在段祺瑞政府的居间调停下进行了和平谈判。时局虽然一时缓和下来，但并没有消除双方的对立。张作霖任命张学良为第三方面军军长，拨给他7万最精锐的奉军，在滦州设置司令部以对付国民军。张学良时而回奉天，第三方面军遂由副军长郭松龄代为指挥。

在奉军几乎全部开拔到关内，奉天的防守极为空虚之际，郭松龄趁机举兵倒戈。看来虚弱的张作霖败亡是确定无疑的了。然而倒戈却以失败告终。一个月后即12月23日，郭军投降，郭松龄遇害。

当时在日本，护宪三派内阁的外相币原喜重郎已连续担任加藤高明内阁的两届外相。众所周知，币原标榜对中国内政实行不干涉主义，但使胜利在即的郭松龄的倒戈受挫，最终给张作霖带来胜利的主要因素，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币原所谓“协调”外交幌子下进行的干涉和对张作霖的援助。这个事件的有关材料主要来自已公开的外务省记录《关于反奉系的纷乱》中所附白井胜美的文章《〈币原外交〉备忘录》。（《日本历史》第126号，1958年。）另外，今井清一最近所著《日本的百年 5 在震荡中摇晃》（1962年）一书也谈及这个事件。本文的课题是以旧军部有关重要文书为资料，通过对倒戈和干涉过程的反思，以探讨对币原“协调”外交的评价问题。

二、倒戈的性质

关于郭松龄倒戈的动机，布施胜治在《中国国民革命与冯玉祥》（1929年）一书中写道：郭松龄得到张学良的信任，掌握了张学良所辖奉军的实权。前几年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他率军在山海关与吴佩孚指挥的直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战功卓著。但在战争结束后，他的部将们如前面提到的那样都得到了分封的地盘，而他本人却没有得到任何赏赐。为此，他对张作霖的赏罚不公非常不满。加之在1925年秋，郭松龄作为奉军代表赴日本参观陆军大演习时思想受到震动，这就进一步增强了他对保守顽固的张作霖及其周围守旧派的憎恶。而最终使郭松龄决心举起倒张作霖大旗的主要因素是他与国民党的接近、有明显亲苏倾向的冯玉祥的影响以及国民党方面的工作。冯玉祥通过使与国民军对峙的

奉军倒戈，既解除了对自己的威胁，又能实现其打倒张作霖，进而取得北京中央政权的目的。随着与郭松龄的联盟工作的进展，双方订立了协议，冯、郭分别于11月20日和24日在协议上签名盖章。协议的内容是：1. 由郭松龄通电劝张作霖下野；2. 若天津的李景林进攻郭松龄，冯玉祥出兵征讨之；3. 如李景林保持中立，待战争结束后授予李景林热河都统之职；4. 将直隶以及京汉全线划入冯玉祥的势力范围；5. 东三省的事务听任郭松龄全权处置，等等。另外，郭倒戈第二年冯玉祥赴苏联访问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欢迎会上所致的答谢辞，证实了如下内容：郭松龄曾向冯玉祥提出了5个条件：1. 打倒祸国殃民的军阀；2. 建立进步的政府；3. 实行平民政治；4. 实行义务教育；5. 保护劳工。冯玉祥赞成这些条件并签了名。（第122—124、150—151页。）

协议或者条件的内容是否如上所述姑且不论，有一点却是不可否认的，即郭松龄决意倒戈，是其思想立场在冯玉祥和国民党的影响下逐步转向国民革命运动所致。在倒戈之后的11月27日，郭松龄向被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以“私人代表”身份派来的“老相识”关东军参谋浦中佐剖露了自己的决心和抱负，他说：“我历来所向往的唯一理想就是以利国富民为中心的民国和平以及世界和平。因此当时我一开始就不赞成奉军打仗，倡导非战论。”其理由有如下7点：1. “中国的内战与世界大战的关联”。奉、冯两军分别以日、俄为后台输入武器进行备战。因此，如果奉、冯双方开战，也就等于日、俄开战，从而导致远东大乱，增加世界大战的危险。2. “以武力统一政策的失败”。纵观中国历史，凡采取武力统一政策的，如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等，无不以失败而告终。张作霖的武力统一政策最终也必将破产，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3. “违背国民的心愿”。军阀们不顾民心所向穷凶极恶地频繁用兵。如今中国的民众渴望和平，因此，作为军人必须体察民心，为国民谋福利。4. “从经济上考虑”。目前中国在经济上、财政上都非常困难，处于濒临崩溃的

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如再进行战争，就会使人民愈益陷入穷困潦倒的绝境。5. “从军队的实际状况看”。奉军一味地扩充，结果成了一伙素质低、训练差的乌合之众，一旦打起仗来则可能一触即溃。6. “从官兵的士气看”。由于作为兵饷的奉票贬值，官兵的待遇明显恶化，甚至在前些年直奉战争中阵亡的将士的遗属抚恤金也难以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如再驱使作战，官兵们即使不倒戈也会逃亡。7. “关于战略问题。”当奉军进攻冯军时，若冯军与孙传芳军配合，则必将置奉军于死地。根据上述观点，郭提出应避免与冯作战，退到关外，放弃直隶、山东的主张。此后，张作霖两次下达了进攻冯军的命令，但郭抗命不从，于是张作霖电命郭返奉。这时如返奉，则必遭杀害无疑，情况迫使郭终于下了决心。郭打算一旦倒戈成功，就将军队移交张学良，自己回乡下去。“我的理想即实行民生主义，迅速整顿交通、财政、教育，改善劳动者的待遇，以防遏民心的赤化。人民既得安居乐业，相信就不致被激而趋入赤化之途。”（关东军参谋部：《郭松龄与浦参谋会谈纪要》，1925年。）

郭松龄之强调所谓“防遏赤化”，不过是为了赢得日本的好感。尽管他的主张是不彻底的，但显而易见也有接近国民党乃至中国民族民主运动的主张。从这个意义上说，郭松龄举兵反张作霖，就不能等同于军阀间的权力之争了。况且这不仅限于郭一人的倒戈。据前面提到的布施胜治书中所述，郭倒戈的根由是奉系军阀内部“新派”与“旧派”的对立。马贼出身的张作霖原来的心腹部将如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同样都是马贼出身的“旧式武将”。然而随着奉系军阀势力的扩张和兵力的强大以及战术的进步，张作霖也不能仅仅依靠这些旧式武将，而需要那些受过新式教育的部将。于是，杨宇霆、张学良、郭松龄等所谓“新派的部将”就聚集在张的周围。这些新派部将与思想倾向不同的旧派部将相互排斥，郭松龄举兵反对张作霖，其中也有这两派相争的因素。倒戈伊始，新派“头子”杨宇霆马上逃到大连，

张学良一时曾谋求与郭松龄妥协。其他新派将领几乎都参加了倒戈。相反，支持张作霖进行抵抗的，主要是那些旧派将领。郭松龄的倒戈尽管决非属于革命的倒戈，但它是在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影响之下发生的。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使军阀内部分化的作用。

12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司令部通电张作霖，要求其下野，25日又通电各国公使，宣告如下事项：1.进入奉天后，将继续尊重既定条约、睦邻关系和租用关系等；2.各国政府要严守中立；3.在作战地区，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保护，等等。26日，郭将所部改名为“东北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并公开了与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的同盟关系。郭松龄原计划在奉天举行兵变，逮捕并审判张作霖。为此，在11月23日夜率部乘坐无灯、无标志的火车直奔奉天。不料郭的行动引起了山海关驻军汲金纯部的怀疑，他们阻止火车前进，郭军不得已折回原地。在奉天举行兵变的计划流产了。于是郭挥师山海关，向关外推进。

郭松龄倒戈的消息传到奉天，空虚无力的张作霖便惊恐万状，绝望地说：“取胜无望是不消说了，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还得去当过去的马贼。没什么指望了。”尽管他还想在连山附近利用原有的阵地工事与郭军“决战”，但这不过是“明知挽救不了败局，唯企望一时之侥幸”而已。（关东军参谋部：《关于张郭之战中有关中国军队的诸情况并有关该战乱的诸问题》，1926年，第2、11页。以下简称《诸问题》。）

郭军是奉军最精锐的部队，因此当郭军打过来时，张军斗志全失，未作任何抵抗即告溃退。连山的战斗在12月5日打响，郭军仅仅施以炮击，张军即“仓惶败退”。张军如此匆匆败退，竟使郭军怀疑对方是否在施行骄敌必败之计，因而在两天之内停止前进。（同上，第26—28页。）郭军在连山之役告捷后，又向锦州推进，这时，汤玉麟、阙朝玺的军队为郭松龄所收买，行动迟缓，张作相则率领他的吉林军逃回老巢去了。在此为了比较详细

地介绍当时中国军阀的腐败状况，试举阚朝玺的军队为例。阚自当马贼时起就成了张作霖的干儿子，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他虽没有立汗马功劳，却从旅长一跃而登上了热河都统的宝座，可见他为张作霖所信任的程度。可是当郭松龄举兵倒戈，他却不顾干爹正处于“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于11月26、27日驮着以收租税的名义搜刮来的价值2000万元的鸦片烟，从热河“从容不迫地撤退”，并派他的参谋长邱天培到郭松龄处“请求妥协……以为生命财产（鸦片）之安全计”。因此，邱参谋长随着郭军一起行动直到最后。鸦片烟由其部下严密地看管着，“在义县宿营之时，将鸦片放置在墙壁坚固的房子里，由卫兵严加警戒，并配备有数挺机枪，甚至关闭了义县城门不许任何人通行等，恰如守卫王公一般”。然而即便如此小心谨慎，还是为“马贼”所乘，在途中被劫走了一半。结果运到奉天的只有价值约1000万元的鸦片。不仅阚朝玺如此，其“部下旅长们也都携带着价值几十万或几百万的鸦片烟，再下至士兵也没有不带着鸦片烟的（最少的也值200—600元）”，“这么一来，阚军就完全成了鸦片军，上下都逃避打仗”。（同上，第41—43页。）

当“连山的败讯传到奉天时，张作霖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他已不再抱幻想，而决定于12月5日逃往南满铁道附属地，声称‘逃往大连，以图再举’并做好了准备”。（同上，第2—3页。）12月7日的《大阪朝日新闻》报道：“张作霖终于要在近一两日内逃亡”，“郭军即将进入奉天城”。

如前所述，中国在五卅事件反帝斗争的激发下，反对奉系军阀的浪潮越发高涨起来。前往中国调查五卅事件的宪政会的望月小太郎，在8月3日的“归国谈”中说，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之后，其实力有冲天之势”。（《神户又新日报》1925年8月4日版）当这位望月为了解北京关税会议情况再次前往中国并于年末归来时，竟然观点大变，说郭松龄倒戈前，“在满蒙的张作霖不得人心，这是无情的事实，80%的人都憎恶他”。（同

上，1926年1月1日。)而且关东军参谋部在“张、郭的人心(奉天)向背状况”问题上也认为，“在知识阶层中占多数的学生事实上心里都欢迎郭松龄而反对张作霖。试举奉天南满中学堂为例，全体师生都相信郭必胜，希望他入城”。后来当这些学生“闻知郭军败北、郭夫妇惨遭杀害，无不悲痛万分，致以深切哀悼。还有在安东的教师们受时局总结讲话的触动，痛哭流涕，以至休学数日以示悼念”。奉军在连山溃败的消息在奉天市民中间引起了“不安”。这是由于“如果奉军的溃兵入城，其狼籍暴行较之郭军更为可怕，因而引起极度的恐慌”。“许多市民相信，郭军作为胜利者入城之后，也会为将来的统治考虑，至少不会马上对市民进行压迫、掠夺，从自古以来中国各地的战例中就可突出地看出这一点。”“希望张作霖早日下野的局面也是很明显的。”“如部分省议会议员以及总商会的一部分人早就暗中给郭松龄写密信表示欢迎之意，并希望郭松龄和平接管政权，他们愿意协助郭促张作霖下野。”（《诸问题》第159页—161页）这时候已有日本将出兵满洲的传言。11月30日，苏州2,000余名大专院校的男女学生召开了“五卅”纪念会，“会后在市区还举行了示威游行，在各处就满洲问题进行反日演说”，“中国满蒙的反日浪潮正在迅速高涨”。（《大阪朝日新闻》1925年12月6日版）中国人民支持郭松龄倒戈，并寄予期望。

但是，要报答这种支持和期望，无论是郭松龄本人还是郭军，都存在根本的缺憾。虽说郭松龄在民族民主运动发展的影响下，表现出了向往国民革命的倾向，但他的倒戈却完全是脱离人民的。郭松龄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军阀，郭军作为一支军阀的军队，在本质上与奉军没有根本的区别。

郭松龄曾向部下反复说明举兵的缘由：“在帝制之下举兵倒戈，为的是在我国实行共和制。怎么能说是反叛呢？这在文告中、讲话中都说得很清楚。”但是将校以下的军官中有不少人在感念张学良的“恩谊”，“营长以下知道打仗目的”的几乎没

有。军官们“较为支持团结，但高级军官却热心于打仗”，实际上他们关心的只是在占领奉天后，能得到由郭松龄组织的政府任命的相应职务，他们在做着“占领奉天之后升官发财的美梦”。（《诸问题》第34—35、40—41页。）

郭松龄在取得连山之役的胜利之后，便确信起兵已经成功而“大意”起来，只顾“埋头于抵奉后的组织政府事宜”，甚至全神贯注在处理郭军在锦州以外地区进行抢掠等方面事件上，因而延误了郭军的进攻时机，使奉军有了喘息的机会。郭松龄不仅叫夫人陪伴而且还携带着数百万元现大洋（有人说是数百万美元）及其它细软，这样他就不愿意离开铁路线，因此也就不能有令人满意的指挥和卓有成效的作战行动了。（同上，第29、31—32、37—38页。）

自12月2、3日起天气突变，降雪达一尺以上。连山战役时，天寒地冻，气温在零下20度以下。但此时郭军仍着夏装，冻伤患者达1,000余人（有说数百人）。郭军“将士的斗志渐趋低落”，在连山之役中降敌的士兵已达6,000名。郭军中的气氛也变得险恶起来，为了保存兵力而不得不以枪毙来威胁。但由于郭军士兵大多出生于奉天附近，随着郭军接近奉天，士兵们越来越无心打仗，陆续有人投降和逃跑。（同上，第26—27、29—30、42、86页。）

在这种情势下，日本帝国主义又横拦在郭军的前面。

三、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应

根据关东军参谋部的观察，1925年10月末中国的形势是“奉军将直隶、山东以及在关外的主力军队陆续集结到关内，加紧准备与孙传芳以及国民军开战，京津地区将再次罹于战祸之中。此外，苏俄与冯玉祥之间的频繁密切的联系已不再是秘密。不难料想，一旦冯、张开战，苏俄的魔爪肯定会伸向满洲。……这时正

值驻满洲的两年义务兵临近退伍之际，这些士兵离开后，师团的实力将会极度减弱，今后能否应付时局的变化，完成军队的所有任务，是值得怀疑的”。此后，经过段祺瑞的调停，冯、张之间的妥协工作有了进展。11月16日，参谋本部通知关东军，两年义务兵不再延期服役，关于“出兵时机”，则根据需要按指示行事。两年义务兵自19日起开始回国。（关东军参谋部《大正14年中国时局详报之一》第1—3页，以下简称《详报》。）

关于郭松龄倒戈的确实报告是11月25日传到奉天的。关东军于26日致电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询问：“如果拒绝郭军进入辽河左岸是中央本部的方针，那应采取什么措施？”参谋本部的回答是：“遵照不干涉内政与维护我国权益之一贯方针，在此范围内，可为排除内部不安及维持地方秩序作出努力。如果今后动乱扩大至南满铁路沿线并有危及我国利益之虞时，宜应不失时机地采取增兵措施。”（同上，第4页。）

27日，关东军开始第一次向奉天集结兵力，同时又派参谋浦中佐前往郭松龄处了解情况。如前所述，郭松龄与浦中佐会谈约两个小时，陈述了自己的信念，并切望日本“严守中立”。他对浦中佐说：“如今除我所抱定的主张，我无它路可走。我极希望能得到全力的支持。然而支持有消极与积极之分。所谓积极支持指的是供给钱财武器等的直接支持。我所希望的是所谓消极支持即日本严守中立。若向一方表示了善意，就不能不承担其失败的重大责任。因此切望日本充分支持国民的心愿，不要偏袒哪一党哪一派。而且支持国民的心愿要支持到底。”浦中佐遵照“白川将军的旨意”向郭松龄提出了3点：1.“举兵扰乱南满，造成中国的大动乱，以致破坏了远东和平”，是否考虑过责任问题？2.郭的“此举不难设想必会给南满的秩序造成重大影响”，对于南满与“帝国政府以及我关东军的关系”如何考虑？3.有否与张“和平解决”的办法？郭回答：1.此事责任在张作霖；2.郭军将维持南满秩序，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3.奉天方面无诚意

和平解决，本人也没有别的办法。对此，“浦作为关东军的参谋表达了个人意见”：“尽管自称有维持南满秩序的责任，但南满离成为战乱之地已不远。一旦南满因战乱而秩序混乱，我关东军势必相机采取适当措施。”他“觉得郭没有一点诚意”，最终结束了会谈。浦根据这次会谈得出如下结论：“1.郭松龄决意彻底讨伐张作霖；2.和平解决已经无望；3.郭将以国民党的主张政策为政纲；4.郭的周围大都是国民党政客；5.郭确实与冯玉祥有联系。”（《郭松龄与浦参谋会谈纪要》）

浦参谋于28日返日报告会谈内容。关东军据此认定：“郭不仅对杨宇霆反感，他的本意主要是驱张下野，取而代之，并表明欲实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如此，东三省为兵乱所扰，必将引入赤俄势力，在我国防上以及满蒙政策上触发起严重势态。”（《详报》第6页）关东军为了坚决维护“南满的秩序”而全然不顾郭松龄提出的“严守中立”的正当要求，确定了援张排郭的方针。

12月1日，关东军拟定了《今后情况及军事应付措施方案》，主要措施有3项：1.在情况缓和时，只限于维持附属地内的治安，不向附属地以外地方派兵；2.“若奉天附近地方告急，除旅顺部队外，将驻扎师团的大部分兵力集结于奉天附近，以防备炮弹落入附属地；占领附属地外侧的据点，必要时（当总领事提出请求时）可在城内配置一部分兵力；3.从朝鲜等地调来的增援部队，根据需要可担任奉天以外据点的警戒。在这种情况下，为执行前项任务，其警戒线可向前推进”。（同上，第8—9页。）

浦参谋为“报告情况”再次被派回东京的途中，于12月1日在下关说了如下的话：“我在满洲的侨民越来越感到生命与财产所受到的威胁。就我军司令部来说，无论什么军队，决不允许其带有军事行动性质的一兵一卒进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对此决心采取断然态度。由于守备士兵正在换防，因此不能断言兵力绝对充足。”（《大阪朝日新闻》1925年12月2日）而在这之前的11月30日，张作霖的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少将也自奉天发电给外务次官

出渊，称：“郭纯系过激派。他如进入奉天，定会当即宣布废除一切条约，日本的所谓特权将化为乌有……如今那种不论是张还是冯入主东三省都可的议论已经不合时宜了”，政府在迅速作出援张的决定后，要指导奉军作战，并指示作抵抗到底的努力。

（白井：《〈币原外交〉备忘录》第62—63页，以下略称白井论文。）日本侨民于11月27日召开了全满地方委员联合大会，12月4日召开了奉天各团体代表大会、长春市民大会，要求日本出兵、增兵。驻奉天的总领事吉田又于12月1日在打给外相的电报中说：“我认为，为维持我国在满洲的地位，作为进一步改变日本势力发展停顿不前的现状的策略，援救厄于目前困境中的张作霖，使之得以迅速地东山再起，这绝非无益。”（同上，第63页。）

住在满洲的日本军人、官吏、侨民在维持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和秩序以及援助张作霖的问题的认识上与军部所定方针的基本点是一致的。1924年12月，体现了参谋本部于第二次直奉大战之后对华政策基本方针的《就中国目前时局回顾我政策上的设计》声称：“对目前满蒙地区与帝国特殊关系的现实，我国舆论沸沸扬扬，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帝国历来坚决要求维持满洲地区的秩序。为此，我们对把该地区的实权者采取的行动与维持治安的目的结合起来的办法，感到高兴并予以支持。而对与此相反的行动是不能漠然置之的。这次在直奉大战中，张作霖的行动即属于前者，并为我朝野所认可。战后，他为胜利所陶醉，热衷于中央政权，但当他为满蒙带来不利时，我朝野是不能认可的……因此帝国劝导张从速加强中俄边境及中东铁路沿线的警卫，将多余的军队撤到关外。至于北京政府方面，则当信赖段、孙二人。专心致力于满蒙的保疆安民，谋划整顿交通和开发地方。必须医治战争留下的创伤。”将满蒙“秩序的维持”作为“帝国的绝对要求”而为此“劝导”张作霖的方针，与陆相宇垣成一的思想也是一致的。“今日之冯玉祥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依赖赤